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兼论杨鑫辉教授的学术贡献

燕良轼*

[摘要] 中国心理学史经过老一辈心理学家的精心浇灌,已经成为心理学百花园中的一朵亮丽的花朵。在众多浇灌者的身影中有一位不能忽视,这就是心理学家杨鑫辉先生。中国心理学史的发展必须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为目标;研究者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与独立的研究立场;在研究中要注意“求真”与“求解”的良性互动;既要善于破“人蔽”也要善于破“己蔽”;要将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相融合;研究者既要善于独立思考,又要有合作创新精神。杨鑫辉先生无疑在这些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后继者学习。

[关键词] 继承与创新;求真与求解;杨鑫辉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并不漫长但却曲折的道路,在当下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与危机。当我们回溯历史的脚步时,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前辈在中国心理学史这个狭窄而价值重大的领域所做出的艰难跋涉而赞叹。我们不能不为梁启超(1923年受中华心理学会之邀,作了《佛教心理浅测》)、张耀翔(1940年在《学林》发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余家菊(在《心理》杂志发表《中国心理学思想》等3篇文章)、汪震(发表《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戴震》等3篇)、徐谥荣(发表在《学灯》上的《中国古代心理学》等5篇文章)等中国心理学史的先驱的睿智与远见而投出敬佩的目光。

我们也不能不为以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赵莉茹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心理学家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中取得的骄人成就而自豪。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怀揣着建立中国人自己心理学体系的梦想,在浩瀚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梳理出中国心理学史基本轮廓与体系,使中国心理学史终于成为心理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什么老一辈心理学家会对中国心理学史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呢?这当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是分不开的,但也与他们孜孜以求的事业心和深厚学术素养密不可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老一辈心理学家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心理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10081。

一、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为目标

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有一个优秀的传统,他们研究的领域虽然是中国心理学史,但是他们心目中一直揣着一个梦想,就是念念不忘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最终目标,也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原动力。早在1939年,潘菽先生就发表了《学术中国化问题刍议》,20世纪80年代,他又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问题,燕国材先生在《先秦心理思想研究中》(1981)也指出:“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四个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立中国的心理学,或使心理学中国化。”我们从杨鑫辉先生的言论与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理想。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一理想,并身体力行。他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医心之道》等著作和文章中都反复表达这一理想。可以说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实现心理学发展的本土化(中国化)和现代化,让心理学能够为建立中国和谐社会服务是杨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心理学家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杨先生特别注重中国心理学体系的建构,他是以建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体系来带动本土化心理学体系的建立。他认为,“现代心理学必须从单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跳出来,以广博的胸怀兼收并蓄其他文化的精华”,尤其是“东方文化的精华”,才能改变其“贫血状态”。(杨鑫辉等,2002,第1页)所以他终身倡导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国在吸收西方心理学科学成功的时候,必须考虑各自的文化背景,进行心理学的本土化,对我们中国而言,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杨鑫辉等,2002,第1-2页;燕国材,1981,第12页)杨先生对潘老的观点“非常提倡并大力倡导”,并相继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关于个体社会化的几个问题》、《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和《大力推进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等文章。他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他说:“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告诉我们,不将心理学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之上,我国心理学事业就不能得到真正发展。”(杨鑫辉等,2002,第3页)杨先生所说的“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与心理学的世界性、国际化并不是相互对立不相容的。我们既重视社会文化取向的本土化,也承认进化遗传取向的世界性、普遍性;既探求本国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又探求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所以在认识和把握心理学本土化发展趋势时,不是与心理学的世界性、国际化割裂开来,而只是要突现出来。”(杨鑫辉等,2002,第3页)可以说,杨先生一生都在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而奋斗!

二、坚定的理论信仰与独立研究立场

从事理论与史的研究,坚定的理论信念与信仰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心理学史,可以说整个心理学的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具有坚定的信仰。纵观自冯特以来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凡是有成就的心理学家无不都有坚定理论信仰。冯特、铁钦纳坚信元素主义和构造主义;华生、斯金纳坚信行为主义;韦特海默、考夫卡、苛勒坚信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皮亚杰、布鲁纳坚信结构主义;维果斯基坚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他们坚定的理论信念与信仰。(燕良轼、曾练平,2011)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研究者树立坚定的理论信仰。以潘菽、高觉敷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心理学家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早在1979年潘菽先生就“提出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这可以说这是他心理学思想理论的核心”(杨鑫辉,1989)。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与杨先生的若干通信中他曾指出：“方法问题是很重要的，忽视了它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即花了力气做动作而结果却不好，甚至很不好。”“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即指导思想问题’”潘老还以树作比，形象地说道：“世界观是根本，辩证唯物论是躯干，方法论是树冠。”“要研究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任何部门，都要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站稳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单纯强调实验研究而不问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那是很容易走错方向的”（潘菽，1981）。高觉敷先生也倡导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老才在不断的探索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习中逐步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燕良轼、杨鑫辉，1998，第 178 - 179 页）。杨鑫辉先生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潘老、高老接触最多，受他们影响最多的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者之一，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伊始就自觉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显然是受到潘老和高老的影响。他在中国第一部《心理学通史》总论说：就研究和编纂中国心理学史来说“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是要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心理学思想，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他们以科学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给各种心理思想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给古代学者戴上唯物论心理思想家或唯心论心理思想家的帽子。”再次重申他一贯坚持的“坚持一个指导思想，贯彻三个维度原则，采用多种具体研究方法”的“一导多元”的思想（杨鑫辉，2000a）。这样的观点杨先生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比如在他 2012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医心之道——中国传统心理治疗学》一书的序言以及在多篇论文中的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表明杨先生坚持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主流价值观是始终一贯的，也是对老一辈心理学研究传统的继承。

所谓“一导”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杨先生说：“所谓‘一导’，是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即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作指导来研究中国传统心理思想研究，“才能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杨鑫辉，2012，第 16 页）他特别强调，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不是要给中国心理学思想“贴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标签”，而是“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心理思想，“还它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它们以科学的评价。”（杨鑫辉，2012，第 16 页）杨先生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主流价值观，与所处时代要求、自己的认识觉悟密切相关之外，也与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

如果说“一导”可以代表杨先生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多元”就可以看成他独立的研究立场。所谓“多元”即是杨先生提出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三个维度的原则：第一，内在逻辑与外部历史条件兼顾的原则，即既要研究心理学思想本身的发展规律，又要看到社会历史条件对它的影响。第二，古今参照的原则，即以现代心理学概念、理论体系为框架，去对照整理心理学思想这份珍贵遗产。第三，中外比较的原则，即对中国与外国心理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思想理清其发展脉络（杨鑫辉，1994a）。如果说，“一导”是他对老一辈研究理念的继承，“多元”就是他对前辈研究理念的超越。他自己遵循这项原则作出了许多超出了前人的多项贡献，并建构了独特风格的中国心理学史体系。该体系在他的《中国心理学史论》中得到了完整表达，将中国心理学史的体系设计为六部分：（1）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学，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编纂学。（2）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学；（3）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学；（4）中国心理学史的系统学；（5）中国心理学史的文献学；（6）中国心理学史的历史学（或称史学史）等；后来又补充了中国心理学史的价值学（杨鑫辉，2002a，第 2 - 3 页）。

三、“求真”与“求解”的良性互动

历史研究既要有科学的“求真”精神,也要有人文的“求解”精神。这样的历史研究才能既能给人以科学,也能给人以智慧。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是“求真”还是“求解”的问题历史学家是有争论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一定要确保科学性,要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手段获得真实的历史,所谓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历史不能给人以科学,但却可以给人以智慧。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这也正是历史永远值得研究的地方。所以有学者干脆认为,“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则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显然,“求真”者强调的是科学精神,“求解”者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应当使“求真”与“求解”有机结合。如果一个史学家不顾历史真实,不去考究、考证、考察、研究历史的真实存在,就会丧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存在价值,泯灭了史学家的良心和科学精神;反之,只顾历史真实,而不去考究事实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那就不能承担起给人以智慧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史记》、《汉书》只是司马迁、班固心目中的历史,它们很难与真实发生的历史完全吻合。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的“求真”是不可能做到的。有时即使做到了,也未必有什么价值。顾颉刚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大家。他专门考证过孟姜女的故事,研究的结论是:孟姜女的故事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是被后人附会到秦始皇的头上。这个考证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很成功。顾先生在“求真”方面做得很成功,可是他仅仅止步在“求真”,而没有进一步“求解”。问一下,为什么人们要把孟姜女的故事附会到秦始皇的头上?那不是民间对秦始皇暴政的一种控诉吗?所以史学家一定要成为一个思想家,这样的史学才能使人获得智慧。历史故事并不天然地给人以智慧,智慧是来自历史学家对史实的“求解”,来自史学家对历史事件赋予思想(刘志琴,2011)。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传统,即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也就是“求真”与“求解”的融合。这种精神在老一代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的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例如杨先生在其建构的方法学体系当中就充分体现了科学“求真”与人文“求解”的结合。他认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是在“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指导思想,贯彻以心理实质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历史主义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应采用归纳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系统分析法(杨鑫辉,1994b,第18-30页)、实证检验法、义理诠释法、计量研究等方法(杨鑫辉,2002b)加以研究。这些方法中既包含了科学主义所倡导的方法,也包括人文主义倾向的方法。他的方法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其中史料考证、实证检验法、计量研究法都是典型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归纳排比,义理诠释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研究方法。

杨先生在对其他方法论述的基础上,还在《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新进展》一文中对义理诠释法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产生于西方释义学又称解释学或诠释学是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的第三种势力,“以文本为对象,以理解和解释为方法,重视整体和历史制约性原则。”是一种人文倾向的研究方法,并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王国芳,1999)。他认为:“理解心理学用体验、理解和解释等方法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生命,实际上就是解释学的运用,这种对生命的解释最后扩大成为一种历史方法,实际上扩大成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精神分析对意义的寻求过程来看,也完全是一种解释学的程序。弗洛伊德的释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表层意义探索深层结构的释义过程,而对是神经症的治疗同样也是一个释义过程,因为治疗的任务就是揭示症状的意

义及其和潜意识的关系,法国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采用的也是解释学方法论,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回归性解读,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杨鑫辉,2002b)

在杨先生看来,释义学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二者可以是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对此他说道:“释义学所运用的方法不是逻辑分析,不是观察或实验,它倚重的是内省、体验、理解和解释,其释义的结果带有历史制约性,因为释义者本身必然受着时间、主观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和实证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客观性、准确性、可证性、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不带任何主观是截然对立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正是两者互补的地方,释义学的缺陷:缺乏普遍性、精确性、再验证性正是实证主义的优势,若结合二者,必定有一个崭新的局面。即实证的诠释法。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验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解、描述和诠释,以达到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全面理解。”(杨鑫辉,2002b)

杨先生认为,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一部分内容可以用现代心理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心理学史作为一种历史科学有许多内容需要具有人文倾向的义理研究或释义学方法的研究,“即把整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当作一个文本,对之进行验证、释义和理解,这样,古代的有价值的心理学思想才能在现代重新焕发它的光辉。”(杨鑫辉,2002b)

杨先生认为,无论是科学的方法还是人文的方法,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在达到对人类的心理现象的理解。它在实证,同时也在诠释,所以他据此提出了“实证诠释”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产物,就是“求真”与“求解”良性互动的产物。

四、破“人蔽”与破“己蔽”的过程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认为,做学问,搞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就是不断破“蔽”的过程。所谓破“蔽”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各种障碍、遮蔽的过程。这些障碍、遮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在的、他人设置的障碍和遮蔽,叫“人蔽”。所谓“人蔽”主要是对古人、对前人、对经典的盲从。另一是来自内在的、自己设置的障碍,叫“己蔽”。所谓“己蔽”就是受自己心理定势、先入之见的遮蔽。作研究、作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梁启超对戴震的这一思想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戴震的“‘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实震一生最得力处。”按照梁启超的解读,初涉学问之途,往往受到“人蔽”,待到深入之后,更多的是受到“己蔽”。用他的话说即是:“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为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已旋自蔽矣。”(梁启超,1998a,第35页)

初学者主要面临的是“人蔽”的问题。因为初学者,知识甚少没有形成已成之见,没有形成心理定势,他们不存在“以所藏害所将受”的问题。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人蔽”的问题。也就是来自前人或权威的遮蔽。梁启超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我并不是说前人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考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梁启超,1998b,第166页)

待到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一定成见和定势之后,就可能干扰和阻碍后继的学习,用某种习惯思维和定势去对待新的学习,就会产生“以所藏害所将受”的问题,这时最需要破除就是“己蔽”。梁启超非常赞成戴震的观点,他认为,做学问“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可是在他看来,破除“己蔽”,比破除“人蔽”更难。他说:“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相差很远还不回头。

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功夫,对于已成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很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迴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来迁就他迴护从前的工作。”(梁启超,1998b,第166-167页)他甚至提出了“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几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梁启超,1998b,第166-167页)他提出:一要忍痛割舍。不能明知错了还坚持己见。他认为朱熹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执着于自己的成见中,纵然被陆象山驳得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连朱熹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人都如此,可见克服成见是多么不容易!二要不断挑战自我,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梁启超,1998b,第166-167页)。

戴震、梁启超这种破“人蔽”与破“己蔽”对待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精神在老一辈心理学史家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等学者身上得到发扬,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破“蔽”的精神才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开出一条路:创立了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继的研究者来说,我们也不应该为他们的研究所遮蔽,应当看到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只做了初步的工作,需要后继者做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出色的研究者都会因为时代的局限和其他历史的或个人的原因受到局限,所以我们这些后继者也面临一个破“蔽”的问题。我们也要敢于向我们的前辈挑战,我们更应该不断向自己挑战,这样我们才能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使中国心理学史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有更大的发展。

五、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融合

前文已述,杨先生与许多前辈一样,虽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心理学史,但是他心中一直揣着一个梦想,就是念念不忘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最终目标,也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原动力。我们从杨先生的言论与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理想。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一理想,并身体力行。早在1992年,他就指出:“我们现在提出搞中国本土化心理学研究,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完全吸取外国心理学界一切先进的东西。要广泛地学习。博采众长,有鉴别地吸收,但不是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照搬的东西,不适合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没有发展的生命力。我们要建立本土化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科学,以至要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这种本土化,是植根于我国文化土壤上,并与心理科学的世界性相辩证统一的本土化。”(杨鑫辉,1992)杨先生认为,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就是采用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要能切实反映本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使适合每个国家民众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杨鑫辉,1992)因此,他与许多老一辈心理学史家一样,反对照抄照搬西方心理学,更反对全盘西化。

但是杨先生及许多前辈心理学家一样,他们在追求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同时,并不排除吸收西方以致全人类一切先进的成果,包括观点与技术。他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与国际视野,与吸收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并不矛盾,相反“它与探求人类共同心理规律的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结合的。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进行中国人的心理实验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量表

和研究方法,要求继承和发扬祖国心理学的优秀遗产,也要求我们学习和借鉴欧美苏俄等外国心理学一切有益的东西。”(杨鑫辉,1999)杨先生认为,世界心理学也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在方法方面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他认为,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他认为研究方法的综合是整个心理学综合化趋势的动力。其次,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他认为仅仅依靠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不能解决心理学研究中的困境,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使心理学长足发展(杨鑫辉,2000b)。

杨先生始终秉持“视界融合”的思维方式,他将这种视界融合称为“综合化”。1999年他在《心理学探新》杂志撰文将“综合化”视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另外两大趋势是本土化或中国化、实用化)(杨鑫辉,1999)。他说:“科学由综合走向分化又上升到一种新的综合,心理科学也是如此。心理学各流派的尖锐对立早已消除,相互吸取、融合发展已占主导地位。”“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长足发展前景很好,学者们还是呼吁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要重视人性的整体研究。在综合的趋势下,学习或借鉴外国心理学时,不要左右摇摆,而应立足本国博采众长,有批判的吸取。面对当前偏重西方心理学的倾向,应当加强苏俄心理学的研究与学习。”(杨鑫辉,1999)他强调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既要立足本国,又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的各个心理学学派,研究者一定要有国际视野,不能画地为牢,一切为古是好,唯古是尊,而是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真正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就。

六、独立思考与合作创新

历史研究需要历史学家们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分析与判断,没有独立思考就会人云亦云,缺少独立见解,就不会获得创造性研究成果。同时现代科学研究也越来越需要团队合作进行,以便利用集体的智慧和资源进行攻关。这正如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所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现代科学研究,特别是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学术研究,仅仅凭科研人员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承担和完成的,必须要依赖集体的智慧。我们从诺贝尔获奖者合作比例的逐年上升以及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北极星导弹制造计划”,中国的神州系列和嫦娥登月系列的研制过程都是可以深刻体会到集体合作重要性。在中国人的历史研究中,从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到明代《永乐大典》,再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无不是集体合作攻关克难的结晶。

中国心理学史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等独立思考与集体合作的成果。首先他们都是善于独立思考者,他们每个人都自成一家,他们对于中国心理学史都发表过系统的独立见解,并都有自己的独立完成的有个人特色的专著和高水平系列论文。杨先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1994)就是首开按范畴、专题、分支横向编写体例的先河,而他的《心理学通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则是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编排的。几位老前辈对于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都有自己坚守的原则,都有自己所使用的方法,都建构了各具特色的中国心理学体系。这些都是他们善于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他们又都善于合作,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凝聚团队精神。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既是团队合作的参加者,又是团队合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潘菽、高觉敷主编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1983)一书中他是参加者;在高觉敷主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1985)教材及《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中他是副主编之一;在《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2009)中担任分卷主编;他还独立主持了《中国心理学通史》(五卷,2000),“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

系列”11本(2012)以及《新编心理学史》(2003)等。从中可见,杨先生在中国心理学的研究中曾充当过多种角色,承担过不同的任务,担当了学术使命。他不但自己从事研究,还具有带领团队、凝聚团队的领袖品质和卓越组织能力。无疑,杨先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

参考文献:

- 梁启超,1998a:《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梁启超,1998b:《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志琴,2011:《不拘一格求真知》,《读书》第11期。
- 潘菽,1981:《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1980年学术会议开幕词(提纲)》,《心理学探新》第1期。
- 钱文忠,2009:《钱文忠全集》,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 王国芳,1999:《解释学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燕国材,1981:《先秦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燕良弼、曾练平,2011:《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原创性反思》,《心理科学》总第34卷第5期。
- 燕良弼、杨鑫辉,1998:《高觉敷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贡献》,见杨鑫辉:《心理学探新论丛》(第1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鑫辉,1989:《论潘菽教授对中国心理学史的贡献》,《心理学探新》第1期。
- 杨鑫辉,1992:《关于个体社会化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杨鑫辉,1994a:《中国心理学史发展的脉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鑫辉,1994b:《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杨鑫辉,1999:《把握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心理学探新》第1期。
- 杨鑫辉,2000a:《心理学通史总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鑫辉,2000b:《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 杨鑫辉,2002a:《中国心理学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杨鑫辉,2002b:《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鑫辉,2012:《医心之道——中国传统心理治疗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杨鑫辉等,2002:《危机与转折——心理学的中国化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永华)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Research on Chinese Psychological History: With a Review of Professor Yang Xinhui's Contributions

YAN Liang-shi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sychology, carefully watered by older generations of psychologists, has become a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spring garden of psychology. Among those psychologists, Mr. Yang Xinhui is the last one to be ignored. In order to develop Chinese psychological history, we must solve the problem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set as our goal to establish China's own psychology system; have a firm faith in the theory and tak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position; and learn how to acquire a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Mr. Yang Xinhui no doubt takes a leading role in these areas and is a worthy example for us followers.

Key word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ruth-seeking and problem-solving; Yang Xinhui